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 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 CSSCI 来源期刊
全国优秀经济期刊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

经济评论

简 报

2014 年第 2 期

《经济评论》编辑部

2014 年 3 月 20 日

编者按

1. 新洛伦兹曲线模型在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应用……………游士兵 王原君
2. 政府管制如何影响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 ……………王贤彬 谢小平 杨本建
3. 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效率……………袁鹏 杨洋
4. 房屋拆迁能够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吗? ……………柴国俊
5. 关注儿童健康与营养, 保障起点公平……………何青 袁燕
6. 政治关联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 ……………蔡地 黄建山 李春米 刘衡
7. 所有制、政治关联与企业超额信贷……………李文洲 冉茂盛 黄俊
8. 经济组织中的联盟与激励……………代建生
9. 全球化分工加剧了我国不同行业劳动者的工资差距吗? ……………孙文杰
10. 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能否用来识别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 ……李春霞 田利辉 张伟
11. 中国上市银行董事会秘书持股降低信息披露质量了吗? ……………翟光宇 武力超 唐大鹏
12. 境外战略投资者提高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吗? ……………张瑜 殷书炉 刘廷华
13. 居民幸福感与公共品货币价值评估……………刘蓉 王雯

《经济评论》简介

编者按

理论一旦为社会大众所掌握，就能焕发出巨大的精神力量和物质力量。为充分发挥经济学研究在经世致用、咨政育人、服务实践方面的功能，以优秀的学术研究成果影响社会精英、影响社会民众，我们决定面向大众传媒，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简报。

大体而言，经济类文章不外乎三种类型：(1) 运用经济学的前沿理论和方法，以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从事经济学专业研究的同行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探索和研究社会经济；(2) 运用经济学理论，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决策者看的文章，目的在于通过影响社会精英和政治精英的思维而改造社会经济；(3) 运用经济学知识，以非经济学专业方式，写给社会大众阅读的文章，目的在于让人们更好地理解社会经济生活。《经济评论》简报就是要把第一类（学术论文）转化、简写为第二、第三类文章。凡在《经济评论》上刊发的论文，均由作者改写成1000—1500字的简写稿，以非专业方式表达作者对社会经济问题的学术洞察与学术思想。

简报文章以原文为基础而改写，兼顾现实性、学术性和可读性。虽是改写，但我们要求文章自成一体，力求以生动的笔调、浅显的案例娓娓道出作者的学术思想，让非专业读者了解社会经济现象，帮助他们思考经济问题，进而获得思想启迪。因此，简报语言平实生动，说理深入浅出，文章简洁明快，尽量避免专业性很强的理论概念、数理模型及其推演、数据表格、专业注释等。阐述观点、研究结论或提出政策建议时，没有罗列大量数据，但有关键的数据或事实支撑。

学术期刊研究成果的社会化、大众化和通俗化是理论服务实践的一项积极探索。我们相信，经过学界同仁的辛勤耕耘，《经济评论》简报将成为一个雅俗共赏的精神园地：既有学术的严谨性、又有表述的生动性，既有理论的逻辑力量、又有实践的事实力量，既有历史的厚重感、又有现实的感染力，从而使《经济评论》在注重学术品位、不断提升学术水准的前提下，进一步扩大学术成果的社会影响，更广泛地服务社会经济建设、服务社会精英和人民群众。

《经济评论》编辑部

1. 新洛伦兹曲线模型在中国收入分配领域的应用

游士兵 王原君 (武汉大学)

《研究收入分配问题的一种新洛伦兹曲线模型:建构与应用》,《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

很多国家(包括我国)统计部门仅公布收入分配分组数据,这种数据中仅含若干个洛伦兹曲线上的点(通常 10 个点左右)。经济学界已经展开了多年研究,试图寻找合适的模型与方法逼近这种分组数据,从中得到相应的统计分布,进而可以使用经济理论中已经存在的理论与方法进行收入分配分析。洛伦兹曲线模型就是这样的模型,主要用于从分组数据出发构造收入分配的统计分布。

有关洛伦兹曲线模型研究的较早文献出现于 20 世纪 70 年代,经过至今 40 多年的努力,直到 2010 年,经济理论界文献中仅出现了 20 种左右的洛伦兹曲线模型。这些模型得到了广泛应用,例如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为了研究全球收入不平等与贫困问题,利用洛伦兹曲线模型,建立了软件系统 POVCAL,该软件被大量用于各国的贫困问题分析。上述这些模型大多只含有 1-3 个参数,应用效果一般不太理想。由于经济制度、风俗习惯、人文背景等诸多差别,世界各国收入分配是极为多样的,任何新的洛伦兹曲线模型都具有重要意义。

对我国来讲,分组数据模型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我国的收入分配数据城乡分列,统计部门仅在《统计年鉴》中发布分组数据,因此,研究我国的收入分配时,精度良好的分组数据模型不可或缺。实际上,洛伦兹曲线模型不仅对收入分配问题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应用价值,工程技术问题中需要估计统计分布的问题也可以使用洛伦兹曲线法。

我们先提出了三种新的单参数模型,再综合利用汤姆森·奥德望等(Ogwang and Rao,2000)提出的杂合技巧,构造多参数洛伦兹曲线模型。我们共提出了 7 种新的洛伦兹曲线模型,其中一些模型具有良好的应用效果,扩大了理论与实际应用中洛伦兹曲线模型的选择范围。为说明新模型的应用价值,先使用中国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等 1993 年的收入分配分组数据,用均方差和最大绝对误差作为误差指标,对模型进行了比较分析,从而说明我们提出的模型是成功的,特别是所提出的一种含六个参数的模型效果非常突出。

最后用这种六参数模型分析我国的收入分配,我们应用湖北省调查总队提供的 2009、2010 和 2012 三年的城乡收入分组数据进行考察,数据中含家庭人口、总收入、总收入的四个分项等信息,分项为工资性收入、经营性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等。测算结果说明,除对工资性收入的估计误差稍大外,其他各项的误差可以忽略不计,模型精度非常理想。

以 2012 年数据分析结果来说,对城镇数据,由模型估计的和由样本算得的基尼系数,两者数值几乎没有差别。其中总收入的基尼系数不大,只有 0.256 左右。经营性收入的洛伦兹曲线估计误差较大,但对基尼系数的估计与样本基尼系数相差却不大。对湖北农村收入分配估计,除对工资性收入的估计误差稍大外,其他各项的误差也可以忽略不计。农村纯收入的基尼系数达到了 0.346,大于城镇总收入的基尼系数,可以判断农村的收入不平等大于城

镇。有 20% 的农村人口没有工资性收入，这是农村工资性收入的基尼系数很大的原因之一。与城镇比较，湖北农村人口的转移性收入还很少，平均不到 500 元，这意味着农村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力度有待完善。另外，城乡人口的财产性收入占比还很小，有很大的提高空间。

湖北省城镇总收入的基尼系数不大，与人们主观感受可能有距离，这一是城镇收入的数据采集限定的是户籍人口，没有包括已经进城的农村流动人口；二是我国城镇数据调查中，高收入人口参与意愿一般不高，调查户中可能一般是中低收入人口，因此数据描述的收入分配的代表性可能存在疑问；三是基尼系数可以分解为各个收入组之内的不平等和收入组之间的不平等，而据测算，我国全国城镇居民收入的加总基尼系数大于 0.3，因此各省城镇居民之间的收入不平等对我国城镇加总收入不平等的贡献可能很大。

2. 政府管制如何影响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

王贤彬（暨南大学）、谢小平（广州大学）、杨本建（中山大学）

《国有经济与城市规模分布演进》，《经济评论》2014 年第 2 期

最近有报道称，中央领导非常担忧特大型城市会否过分膨胀。这显示出中国城市化推进过程中，合理的城市规模的重要性。如果城市没有处于合理的规模区间，则不仅损失经济效率，也会给广大居民带来福利损失。实际上，一个城市的规模大小，并不是由其自身独自决定，而是由该城市与其他相关城市共同作用所决定。因此，关注城市规模问题，必须把所有城市看成一个体系，落脚到城市体系中的城市规模分布中来。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科学与合理地评判中国的城市规模是否合理。

实际上，尽管中国的少数特大型城市经常被诟病为过分膨胀，但北京、上海和广州这些特大型城市在中国数百个城市中仅是极少数。由于中国各个省区存在强大的行政力量，因此各个省区的城市发展一定程度上是分割和独立的。总体上，中国大部分省区的城市体系存在集中度不足的基本特点，呈现一种中小城市多而大城市少的格局。城市体系集中度不足，导致了经济效率损失。如果城市集中度不足确实带来了经济效率损失，那么探究城市体系集中度不足的原因，进而寻找解决集中度不足的手段则是更加重要的问题。

中国的城市规模分布演变除了受到一般性的经济力量的影响之外，还与中国特有的政治行政体制力量有关。中国建国以来成为一个政治集权的计划经济体，计划体制由上而下覆盖全国。改革开放以来，计划经济逐步向市场经济转变。但是，计划体制遗留的许多力量与影响仍然存在。中国无论是在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还是市场经济体制时代，政治上都是集权的，但在经济上却都呈现一定程度的分权。这种分权是由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所决定的，中央为了掌控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运行，需要通过覆盖全国各地的公共与准公共组织实施各项政策，这种持续存在的组织除了政府机构之外，最主要的就是国有企业。因此，国有企业的覆盖与重要程度反映了国家对经济社会的控制程度。由于国家控制需要国有企业的广泛覆盖，因此国有企业力量越强的地区，其城市规模分布会更加分散，城市集中度越低。

这一发现与现有的国际观察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国际经验,处于发展中阶段的国家的城市规模分布往往是过度集中的,而其背后的主要动因是政治权力集中于行政中心城市,企业和居民为了寻求政治关联及享受公共品等目的涌向行政中心城市,进而导致城市规模分布过度集中。而在中国,除了作为首都的北京由于政治力量可能过度扩张外,大部分的行政中心城市的相对规模并不算高,这很大程度上源自地理空间上的全面经济管制。

国家力量对经济社会的掌控和管制力度强,会限制资源要素自由流动配置,难以实现资源有效使用。中国的经济体制力量导致的不是过度集中而是过度分散的城市规模分布。中国需要在未来进一步降低国家力量对经济社会活动的管制程度,进一步提高市场化程度。

3.要素市场扭曲与中国经济效率

袁鹏 杨洋(大连理工大学),《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

要素市场扭曲指的是市场不完善使得要素的市场价格偏离其机会成本,进而导致要素的非最优配置。由于中国要素市场的市场化改革进程滞后,要素市场在不同的所有制企业、行业、地区以及城乡之间的分割仍普遍存在。现有研究表明,虽然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程度和方向在不同的要素、不同的行业、地区以及所有制之间具有一定程度的差异,但总体上较为严重。

那么,要素市场的扭曲对经济效率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一些学者进行了研究,采样的方法主要是前沿分析法和基于要素错配的增长核算框架。这些研究的基本结论是一致的,即要素市场扭曲给中国经济效率带来了较大的损失。然而,在研究方法上,上述两种方法都存在一定局限。前者只能考察要素市场的总体扭曲,而不能解析单个要素的配置扭曲,更无法就不同生产单元在单个要素上的扭曲程度进行比较。后者在测度要素错配时首先需求得要素的边际产量,涉及对要素产出弹性的估计。通常的估计方法有两种,生产函数回归法和参数校准法,生产函数回归法得到的产出弹性实际上包含了要素市场扭曲的效应,再用其作为测度扭曲的基准明显不妥,而参数校准法则存在太多的结构性假设和参照系选择的难题。针对以上不足,我们采用了影子成本模型,从要素、时间和地区三个维度,更为准确地衡量中国要素市场扭曲状况及其对经济效率的影响,得到了以下三个结论:

第一,1985-2010年期间,平均而言,劳动力与资本的边际产出比率低于市场价格比率,劳动力相对资本的投入量存在9.1%的过剩,与中国长期存在的就业冗员现象相符。不过,在最近的2005-2010年期间,劳动力与资本之间的价格扭曲和配置扭曲发生了扭转,劳动力的相对价格由过高转为过低,投入由过剩转为不足。这一逆转过程在中西部地区表现得尤为突出。这种变化的原因在于:一方面,劳动力市场的二元分割使得劳动力资源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另一方面,各地违背比较优势的赶超行为,使得资本被大量地投入到资本密集型产业,降低了新增资本对劳动力的吸纳能力,加剧了就业不足。

第二,就研究期间的平均而言,能源与资本的边际产出比率高于市场价格比率,即能源

的市场价格相对偏低，且能源相对资本存在2.2%的投入不足。分时段来看，能源相对资本的价格扭曲和配置扭曲也经历了逆转过程，由期初的相对价格偏高和投入过度，转变为2000年之后的相对价格偏低和投入不足。西部地区与东、中部地区的能源相对价格扭曲和配置扭曲也存在明显差异，其原因在于，能源价格管制使得地区间能源边际产出的巨大差异没有在价格上得到反映。

第三，研究期间，全国平均的经济效率年均增长率为0.318%，主要的增长来源是技术效率的提高，而非要素配置效率的改善。这表明要素配置效率还有较大的改进空间。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05-2010年期间，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提高，导致配置效率下降，进而导致经济效率出现了下滑。

上述结论表明，中国要素市场的扭曲在时间和地区两个维度上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从时间维度来看，要素市场一度出现了扭曲程度趋于下降，配置效率逐步提高的局面，但是由于要素市场市场化改革的滞后，要素的价格变化滞后于要素边际生产率以及要素市场供求关系的变化，导致要素之间的相对扭曲从一个方向逐步滑向了另一个方向。从地区维度来看，各地区要素市场的扭曲程度甚至扭曲方向存在明显差异，表明要素市场的一体化还远未形成，存在严重的地区分割。

要素市场价格扭曲与非效率配置的普遍存在，影响了资源配置效率的提升，提高了经济运行成本，限制了经济效率的改进。从积极的一面来看，中国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经济效率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但这需要进一步消除要素市场扭曲。从政策角度，消除要素市场扭曲，首先必须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动政府职能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转向以提供公共产品及服务为中心，“把错装在政府身上的手换成市场的手”。其次，要加快要素市场的市场化进程和一体化建设，构建一个能够反映资源稀缺程度的要素市场体系。

4.房屋拆迁能够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吗？

柴国俊（河北经贸大学）

《房屋拆迁能够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吗？——基于中国家庭金融调查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

住房问题是人类社会古老的话题，在日益繁荣的现代社会仍旧重要。住房的拆除很多时候是政府的强制行为，拆迁补偿纠纷及经济后果从来都是报端热点。房屋拆迁能够提高家庭消费水平吗？这个看似寻常的问题在学术上的答案却是因家庭而异的。

笔者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一个家庭住房突然拆除就相当于这个家庭遭遇到一个经济冲击，加大该家庭面临的不确定性进而限制其消费能力。家庭的不确定性大体分为两类，既包括时间维度自身的收支风险，也有来自空间维度的周边参照群体收支状况对自身的“威胁”风险。这两种渠道的政策治理途径是不一样的：如果来自第一种渠道，则提高各种社会保障覆盖面就会降低家庭未来不确定性并能提升家庭消费水平；如果是第二种渠道，提升家庭消

费则要考虑周围人群的影响,创造更好的流动机制来满足他们寻求社会地位的动机可能更管用。遭遇负面冲击的同时,住房拆迁家庭或多或少会得到一些补偿,永久收入理论或生命周期理论预测,房屋拆迁补偿能够增强家庭长期消费水平。因此,一个拆迁家庭一方面面临重要资产的损失,这会加大人们的未来收支风险或提升社会地位动力进而限制其消费能力,另一方面又会因得到拆迁补偿而增强其消费能力,两种效应的综合效果可能因家庭而异。

按照拆迁后住房套数不小于 2 或是等于 0,拆迁家庭可分为拆迁后多套房家庭或拆迁后租房家庭两类。简单的描述性统计即表明,拆迁行为对这两种类型的家庭经济冲击是不同的。具体来说,拆迁后变为租房的家庭其平均消费水平甚至低于未拆迁户,而拆迁后仍有多套房家庭的消费平均数和中位数均远远高于未拆迁户。采用较严谨的平均处理效应方法进一步验证拆迁户消费冲击存在异质性这样的结论。通过对拆迁家庭异质性的深入分析发现,拆迁后租房的家庭较拆迁后仍有多套住房的家庭在社会保障方面劣势不显著,但寻求社会地位的程度不同,这初步符合预防性储蓄理论和社会地位提升判断。此外,剧增的奢侈品消费折射出拥有多套住房的家庭“冲动消费”行为,并不符合生命周期假说中的理性消费,需要政府有力引导。最后的实证回归结果进一步证实,同伴收入风险越大,也即社会地位寻求动机越强,租房家庭的消费支出受拆迁冲击越不显著,而拆迁户中多套住房者的地位寻求动机较弱,故比租房者消费显著下降得更大,符合社会地位提升动机。同时,社会保障显著为正的事实证伪时间维度的收支风险解释适用性。

总的来说,研究目的是探讨拆迁行为对家庭的消费冲击。实证结果发现,笼统地考察拆迁群体并不可取,拆迁家庭具有异质性。那些拆迁后租房家庭受到的消费冲击总体是负面的,而那些拆迁后多套房家庭反而会增加消费支出。政策建议也是明显的。首先,基层政府在补偿拆迁损失时候应区别对待不同的家庭,以缓解社会矛盾。其次,关注同伴“威胁”尤其拆迁租房家庭寻求社会地位动机而并非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是提升家庭消费水平的有力措施。笔者否定了政府出台政策“一刀切”的传统做法,更进一步指出关注弱势群体生活特别是营造穷人提升社会地位环境的关键作用。

5.关注儿童健康与营养,保障起点公平

何青 袁燕(西南财经大学)

《儿童时期健康与营养状况的跨期收入效应》,《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

儿童时期的健康可能对成年以后的社会经济地位存在着长远的影响。儿童期是人生发展的重要时期,一方面,这一时期的营养状况直接关系到其成年以后的健康素质,而成年时期的健康又会影响到劳动供给和劳动生产率,从而影响劳动收入;另一方面,儿童时期的健康有可能会影响认知能力(cognitive skill)和非认知能力(non-cognitive skill)的形成,进而对其成年以后社会经济地位产生持续影响。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同成年个体在人力资本以及获得收入的能力上的差异很可能在其年幼时就已经决定,成年以后的收入差距很可能部分源于儿

童时期的健康与营养状况的差距。

近年来,中国儿童的营养状况虽然有所改善,但仍不容乐观,且存在较大的城乡、地区差距。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的长期跟踪调查数据显示,如果以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计算,在0~18岁之间出现过生长迟缓的儿童比例为17.7%,在0~6岁出现过生长迟缓的儿童的比例则高达25.8%。中国妇幼卫生事业发展报告(2011)显示,2005年中国农村5岁以下儿童生长迟缓率是城市的5.3倍,农村5岁以下儿童低体重发生率是城市的4.4倍。1992-2005年中国5岁以下儿童贫血患病率在12%~20%之间徘徊,没有显著改善,西部农村地区是儿童贫血的高发地区。如果不采取必要的公共政策,改善健康与营养状况较差的儿童的生存状况,这些儿童的健康和人力资本积累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很大负面影响,很可能导致其成年以后在劳动力市场表现和收入落后其他个体。

我们使用CHNS的长期跟踪调查数据,采用儿童时期主观评价的健康状况得分、身高、体重以及日均膳食营养摄入等多种指标,验证了儿童时期较差的健康和营养状况对成年以后收入存在巨大负面影响。特别是16~18岁时期的健康营养状况尤为重要。这一时期正是读高中、中专时期,或者刚结束义务教育进入劳动力市场,并且是身体生长发育关键时期,这一时期在一定程度上决定其最终能实现的受教育程度或进入劳动力市场时的劳动技能,这些都对其成年后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及获得收入的能力产生巨大影响。同时,我们还发现,母亲的受教育程度对小孩成年后收入存在显著的正向影响。

上述研究从长期经济效应的角度论证了实施针对儿童健康与营养的公共政策的必要性,为理解中国收入不平等的起源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从长远来看,要降低收入差距,减少贫困人口,有必要采取促进儿童在健康这一重要初始禀赋上实现平等的公共政策。改善儿童营养健康状况和提高妇女的受教育程度,一定程度上可以缓解将来的收入不平等问题。

6.政治关联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

蔡地(山东大学)、黄建山(上海证券交易所)、李春米(西安交通大学)、刘衡(中山大学岭南学院)

《民营企业的政治关联与技术创新》,《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民营企业家成为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他们也成为“两会”上的一道亮丽风景。与此同时,也有越来越多的退休官员到民营企业担任董事或高管等职务。与国有企业因产权性质而天生地具备政治关联有所不同,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政治关联则是其自主选择的结果。除了政治关联,对于我国民营企业而言,技术创新困境是另一个值得关注和研究的话题。长期以来,我国绝大部分民营企业的竞争优势仍主要源于相对低廉的劳动力和土地等生产要素。未来,随着人口红利的逐步消失和生产要素价格的不断调整,上述优势将愈发不可维系,因此,通过技术创新实现由低层次的“成本竞争”和“资源竞争”上升到高层次的“产品价值竞争”,已经成为当前我国民营企业的必然选择。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以来,东

南沿海地区一些民营企业频频陷入经营困境，更是深化了政府和学界对这一问题的认识。

现实中，一方面是许多民营企业通过各种方式构建政治关联，另一方面是大量民营企业面临技术创新困境。由此，这驱动着我们思考：政治关联会如何影响民营企业的技术创新呢？显然，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既可以从理论上丰富我们对民营企业政治关联经济后果的理解，也可以从实践上为民营企业通过技术创新实现转型升级提供有益启示。

为此，我们利用第八次全国私营企业抽样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政治关联对我国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影响，并进一步分析了这一影响对不同规模和地区的民营企业是否存在显著差异。我们根据民营企业是否人大代表或政协委员来定义其是否具备政治关联，并同时使用研发决策和研发投入密度作为创新投入度量指标、是否拥有知识产权和知识产权数量作为创新产出度量指标，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同没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相比，具有政治关联的民营企业更加积极地进行创新投入，并取得了更多的创新产出，这说明政治关联有助于民营企业开展更多的技术创新活动。进一步的分析还发现：政治关联对民营企业技术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随着企业规模的增加而减弱。另外，分组回归分析结果表明，当企业处在制度环境较为完善的东南沿海地区时，政治关联对其技术创新活动的促进作用会明显减弱。

上述研究结论的启示是：对于民营企业（特别是小型民营企业）而言，如果所处地区的制度环境确实阻碍了自身技术创新活动的开展，则可以通过构建政治关联谋求创新活动所需的资源并保护技术创新活动产生的收益，但应努力避免把政治关联作为一种寻租手段，以免损害整个社会或行业的经济效率；对于政府部门而言，应该努力扫除各项制约民营开展技术创新活动的正式制度障碍，营造鼓励技术创新的激励结构。具体地，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第一，进一步深化金融市场改革，以降低中小型民营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第二，进一步完善各项保护知识产权的相关法律法规并加强执行力度和保证司法公平，严厉打击各种侵犯知识产权的行为；第三，尽量减少政府对微观经济的干预活动（过多审批、行政罚款等），以保证民营企业能通过技术创新活动获取高额收益。

7. 所有制、政治关联与企业超额信贷

李文洲 冉茂盛 黄俊(重庆大学),《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

金融资源配置在经济增长中起重要作用。金融系统的基本功能始终是实现储蓄向投资的转化，前提是市场化运作。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金融市场具有一定的特殊性，一方面，以资本市场为基础的直接融资尚未成为公司主要融资方式，银行控制了大量的经济资源，银行贷款仍然是公司资本的主要来源；另一方面，尽管市场化改革逐步深化，但政府对资源分配、企业经营等经济活动的干预仍然比较多。长期以来，由于政府行政干预的存在，国有商业银行更倾向于将信贷资金配给到与各级政府有密切关系的企业。为取得政府干预的利益，主动寻求政治关联成为多数企业的理性选择。那么当我国民营企业开始寻求政治关联，其面临的融资约束是否得到缓解？商业银行是否正如某些学者所言，对某些与政府关系密切的企业提

供了超额信贷,而对其他企业信贷不足?这些问题的回答有助于加深对我国金融市场运行态势的了解,并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进一步完善提供依据。

超额贷款现象易于感知,难以度量。我们借鉴过度投资研究领域的方法,根据企业的财务特征估算出企业正常需求的贷款额度,然后用企业实际银行负债与估算值之差的绝对值作为超额贷款与贷款不足的代理变量,再以此为基础展开后续研究。研究发现:在我国银行业普遍“惜贷”的局面下,某些上市公司依然取得了银行的超额信贷支持;获得超额信贷支持的大多是国有企业,并且高管的政治背景以及企业对地方经济的影响力强化了国有企业超额贷款的形成;某些民营企业尽管也得到了超额银行贷款,但起主要作用的是银行关系,而非政治关联。由此可见,在我国经济转型时期特殊的制度安排下,政治关联作为一种替代机制可以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帮助其获得银行的信贷支持,但政治关联的“贷款效应”尚不足以造成银行体系对民营企业的过度借贷。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产权的同质性决定了国有企业在信贷配置方面的优势地位,而其政治关联型高管的存在使得这种优势进一步加强,从而加剧了国有企业过度举债的程度。此外,我们还发现,金融业的市场化改革对抑制国有企业的超贷行为基本上不起作用,却显著地抑制了民营企业超额贷款的形成。

尽管如此,我们最后依然认为,对民营部门的成长和国家的经济发展而言,促进金融市场的发展、加强法律和政府对产权的保护、建立更加市场化的制度环境才是长久之计。原因有三:其一,虽然政治战略作为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诸多企业的主导型战略之一,其对企业资源获取的影响举足轻重,但其消极作用同样不容忽视。政治关联所带来的“政治性”贷款、税收减免和政府配额、执照、许可证、特许经营的审批等政策优惠,往往会扭曲价格机制并造成不完全竞争,进而对经济增长和社会结构变革产生负面影响。其二,政治关联虽然能够缓解民营企业的融资约束,但其作用机理客观上也会在民营企业间衍生出类似国有与民营的“所有制”竞争——政治关联民营企业获得“准国企”的保护,而非政治关联企业的外部环境依旧没有得到改善。其三,在内部治理结构和外部治理机制难以有效约束内部人机会主义倾向的情况下,企业借助政治关联等非正式的替代性机制进行外部融资的行为很可能掺杂着公司终极控制人的侵占动机。在我国当前制度背景下,对大股东利用政治关联等替代性机制进行“侵占性”债务融资的担忧并非空穴来风,这或许也是未来公司治理与公司财务研究领域的重点。

8.经济组织中的联盟与激励

代建生(昆明理工大学)

《团队生产防联盟激励机制设计》,《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

在现代社会中,生产经营通常会以组织的形式出现,比如企业、协会、事务所等等。在组织这个大家庭中,由于组织成员的投入对联合产出的贡献难以准确计量,容易诱发成员偷懒和搭便车等道德风险问题,致使组织的生产效率低下。为了克服这一问题,组织需要采取

激励手段来调动工作人员的积极性。

现代组织中通常会存在多个或明或暗的利益团队，比如，组织中的财务、营销和生产部门等都具有各自的部门利益，组织中职位相近的人群也有共同的利益，组织高层、中层和基层员工在利益方面常有各层级的共同利益。因此，组织对员工的激励，常常需要考虑到员工所在部门或所处职级的利益。

经济组织中的物质激励，在本质上，涉及到组织利益的分配问题，这包括在各个不同的部门及各个不同的层级之间进行分配。生产部门的一线产业工人，既希望生产部门能从整个组织收益这个大蛋糕中分得更大的一块，同时又与其他部门的基层员工一道，呼吁提高基层工人的待遇。

经济组织的利益分配，以组织内部有关利益分配的规章制度的形式反映出来，在遵循基本的法律约束基础上，由组织内部通过讨论决定。参与利益分配规章制度制定及最终表决，或实际影响利益分配规章制度条款的成员，在事实上决定了组织利益的分配。一般来说，对组织最终决定有影响的成员，比如股东、经营者、特殊的技能人才，构成委托人集团，而其他成员，一般的技术人才和普通员工，构成代理人集团。在企业等经济组织中，委托人集团在通过利益分配来调动代理人集团积极工作从而实现组织利益最大化的基础上，希望获取最大的利益份额。代理人集团不参与分配规则的制定，因为这一集团的成员没有资本和权力与委托人集团进行谈判。

关于企业不同员工薪酬结构的差异。在企业中普通员工通常只能获得薪酬、福利或奖金（经济激励）而不能获得股权激励（企业剩余分享），而股东及高层管理人员则可获得包括股权激励在内的一些利益分配，参与企业净剩余的分享。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员工薪酬结构的差异呢？因为员工之间存在谈判能力的差异，普通员工只具有一般的劳动资源，这类资源从市场供需来看并不稀缺，其资源几乎处在完全竞争的市场上，因而面对大股东和高级管理层几乎没有任何谈判能力。拥有特殊技能的人才拥有相对稀缺的智力资源，尤其是 CEO 等高管人才，对经营的企业拥有其他人所不具有的独特的能力，难以替代，因而具有较强的谈判能力。

关于效率工资现象。效率工资现象，是指企业一般员工可获得高于市场出清确定的工资水平的经济现象。尽管普通员工面对企业高管和股东没有什么谈判能力，但他们却可能结成联盟进行讨价还价，比如工会。企业可通过解聘的方式促使单个或少数员工仅获得由市场出清决定的工资水平，但不能对所有或数量众多的员工采取这种方式，尤其是某些员工团队，这些团队在离开该企业后，团队整体或部分成员仍可加盟到其他企业，并能创造比团队成员单干所能创造的效益之和更高的效益。因此，要防止此类团队集体跳槽，就必须给予他们那样的薪金水平，使得从团队总体来看，跳槽不是最优选择。

关于内部人控制。传统理论认为，剩余索取权和控制权的不相匹配是导致内部人控制的主要原因之一。除了这些理由，以下原因也滋长了内部人控制现象。一方面，由于股权分散，每个股东相对于企业管理层的谈判力很小，并且股东之间不易形成联盟来对抗管理层，这一

点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尤为明显。另一方面，相对于股东，企业管理层因为其特殊的资源（比如管理能力）而拥有较强的谈判力，不仅如此，企业管理层还可能达成默契共谋，并形成利益集团，以至于将企业置于管理层控制之下。

9. 全球化分工加剧了我国不同行业劳动者的工资差距吗？

孙文杰（南京审计学院）

《国际外包、劳动力市场进入歧视与行业技能工资差距——基于1995-2011年中国工业行业的面板数据》，《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经济的相互依赖度正在加深。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对外贸易占GDP的比重从1980年的12.5%一直增长到2012年的47.3%，中国已连续两年成为世界货物贸易第一大出口国和第二大进口国。但是，另一方面，伴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近年来我国行业内不同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差距也在持续拉大。《中国劳动统计年鉴》的数据显示，我国城镇私营单位行业年平均工资仅为城镇单位行业年平均工资的55%左右，我国制造业行业专业技术人员与普通技能劳动者的工资之比从1995年的0.96上升到2011年的1.59。

中国正处于经济转型时期和当前国际分工体系中的低端环节，我们不禁要问，随着中国融入全球经济的程度不断加深，全球化分工是否引致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利益在我国不同群体间的不均匀分布？传统理论认为，全球化分工会通过市场竞争、资源重组、技术升级等方式影响一国的行业收入差距。譬如，在一些沿海地区，我国主要以生产、组装的方式或者承担国际外包的形式参与到全球化分工体系中，全球化分工会通过技术升级和产业升级相对增加各制造业对高技能劳动力的需求水平。此外，在国际外包活动中会运用大量的新技术，这也会导致发展中国家增加对高技能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从而拉大行业工资差距。

值得注意的是，传统理论均以劳动力要素在产业间的完全自由流动为前提，然而转型时期的中国劳动力市场并不完全符合这一要求。由于历史原因，在我国诸如金融、石化、电力等行业中存在着非常高的进入壁垒，这些行业的劳动力市场具有很强的分割性，它们属于主要劳动力市场，进入者需要有很好的**人力资本和较高的社会资本**，一旦进入，则能享有比较好的工资福利。那么，全球化分工与我国转型时期的劳动力市场进入歧视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通过理论推演和基于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的实证研究发现，全球垂直分工虽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显著改善我国竞争性行业的劳动力进入和退出条件，但是总体上全球化对我国垄断行业的劳动力市场进入影响有限，国内垄断行业在劳动力进入条件、工资决定机制和劳动力剩余分享等方面仍然存在着严重的体制障碍。实际上，全球化分工对我国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劳动力进入歧视的差异化影响是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我国不同技能劳动力行业工资差距扩大的重要原因。并且，进一步的研究显示，不同技术层次的国际外包活动对我国竞争性行业和垄断性行业技能工资差距的影响存在显著的行业差异性。

因此,现阶段急需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来缓解全球化分工对我国行业工资差距扩大的影响。首先,应充分利用世界资源和技术,不断提升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附加值和技术含量,缓解行业内技能工资差距。长期以来,我国加工贸易的低附加值、低技能密集型特征十分突出,这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我国整体劳动报酬的正常增长,导致低技能劳动者与高技能劳动者的工资差距不断扩大。政府应在财政税收、银行信贷等方面采取各种优惠措施,积极鼓励劳动密集型产业的企业加大在产品研发、品牌提升方面的投资,鼓励企业通过海外并购的方式获取先进技术,不断扩大高科技劳动密集型产品的出口等等。其次,政府应在制度层面积极构建低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劳动力的转变机制和环境。一方面应建立多渠道、多层次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通过职业培训和人才交流等平台不断加强本国低技能劳动力向高技能劳动力的培育,进一步优化人力资本投资结构,增加高技能劳动力的有效供给;另一方面,要尽快打破部分垄断行业的就业歧视和劳动力市场进入障碍。现阶段需通过各种政策措施消除限制劳动力自由流动的制度障碍,加快劳动力在不同行业间的流动,进一步优化和释放人力资本定价,缓解由此导致的行业工资差距。

10. 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能否用来识别中国上市公司的融资约束?

李春霞 田利辉 张伟(南开大学)

《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融资约束还是收入不确定?》,《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GDP的年均增长率基本保持在9%左右。长久以来,我国经济增长对投资规模依赖程度非常高,但在2007年以后,经济增长率和投资率呈现出“剪刀差”的走势,这意味着未来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可能要靠提高投资效率。对微观企业而言,公司的业绩增长同样取决于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

在我国转轨经济过程中,公司的投资规模或者说投资项目能否实现关键取决于其外部融资的状况。公司金融通常将企业最优投资所需资金不能够满足的程度定义为“融资约束”,关于融资约束的研究一直是该领域的热点话题之一。如何衡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长期以来也是备受争议,如果衡量指标选取有误,会直接影响到相关重要问题的研究结论。1988-2004年长达16年的时间,国内外文献一直钟情于使用投资支出对经营现金流的敏感度(简称投资-现金流敏感性)来衡量企业面临的融资约束,同时在这期间这一指标也是饱受质疑。一方面,从理论上讲,经理人的在职消费等带来的过度投资也会造成较高的投资-现金流敏感性;另一方面,从经济计量上讲,经营现金流同时包括了部分投资机会的信息,即便没有融资约束,投资支出和现金流之间也可能显著正相关。为避免用投资-现金流敏感性识别融资约束出现的上述质疑,阿尔梅达(Almeida)等2004年开创性地提出,可以用现金持有变化和经营现金流之间的回归系数(简称现金-现金流敏感性)来识别融资约束强弱。他们指出,由于外部融资成本要高于内部融资,因而企业需要从现金流中增加现金储备来保证后续投资

项目的实施，故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越高，其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也更高。

众所周知，资本生产率（或称投资效率）的增加会促使公司将金融资产转化为物质资产，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现金流的增加，因此公司会在投资效率较高时加大当期投资额而减少现金储备，这正是里迪克（Riddick）和怀蒂德（Whited）2009 年用收入不确定性理论解释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为负的作用机制，他们的这一发现可能会颠覆前人建立在阿尔梅达（Almeida）研究结论基础上的相关研究。

可以说，我们首次将融资约束和收入不确定性统一起来，对我国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这一问题展开研究。我们采用严谨的计量方法进行实证检验后，发现了与西方国家略有差别结论。我国上市公司现金-现金流敏感性的符号与公司面临的融资约束程度密切相关。对于融资约束公司而言，信息不对称效应占主导，其考虑更多的是未来投资资金所需而持有较高的现金水平，因而表现为从正的现金流里提取更多的现金储备，故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为正。而对于非融资约束公司而言，收入不确定性效应占主导，其较少考虑未来资本投资的融资问题，考虑更多的是未来现金流风险的问题，当期现金流水平越高，意味着资本的边际生产率越高，于是会从现金流里减少现金储备、甚至动用前期积累现金进行投资，故现金-现金流敏感性为负。

我们利用现金-现金流敏感性巧妙地将融资约束、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之间的关系统一起来，这样不仅解答了微观金融中现金-现金流敏感性能否识别融资约束的问题，而且某种程度上回答了宏观经济关注的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如何促进经济增长的问题。

11.中国上市银行董事会秘书持股降低信息披露质量了吗？

翟光宇（东北财经大学）、武力超（厦门大学）、唐大鹏（东北财经大学）

《中国上市银行董事会秘书持股降低了信息披露质量吗？——基于2007-2012 年季度数据的实证分析》，《经济评论》2014 年第 2 期

资本市场从诞生的那天起，信息披露就始终为投资者所关注。随着资本市场的日趋完善，信息披露也成为资本市场健康发展、维护投资者利益必不可少的部分。董事会秘书作为上市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客观的信息披露是其重要的工作职责。同时，上市公司出于股权激励等目的，令高级管理人员持有股票已经不再是新闻。那么我们不禁会产生疑问，如果董事会秘书持有所在上市公司的股票，会不会因为自身利益与股票价格绑定，从而影响了信息披露的质量？虽然经济学的理性人假设认为经济主体出于自身的利益而进行行为的选择，因此推理出于保护自身资产的考虑，董事会秘书往往会选择向外界披露有利于公司股价的信息，隐藏不利的信息。这样就会造成公司对外信息披露质量的下降，从而不利于资本市场的整体发展。但同时董事会秘书持股的期限等条件、法律法规的限制等等都会约束董事会秘书的行为。也即决定微观主体行为选择的因素通常存在多样性，尤其我国尚处于资本市场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所以董事会秘书行为选择是否会遵循传统观点有待商榷。商业银行是一国金

融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上市的商业银行必然受到资本市场的关注。因此研究商业银行董事会秘书持股与信息披露质量的关系就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如果商业银行董事会秘书持股造成了信息披露质量的下降，那么监管部门有必要采取新的措施以防止资本市场的漏洞。

KV 度量法是目前判断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优良方法之一，其基本原理为：如果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高，则投资者的股票收益率对其股票交易量依赖性较弱。如果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质量差，则投资者无法借助信息披露对上市公司投资价值进行判断，从而对其股票交易量依赖性较强。KV 度量法的优势在于其动态地将信息的自愿披露与强制披露结合在一起综合分析。其不具体统计信息披露内容，而是充分利用市场股票数据进行分析，利用市场对公司信息披露综合评价进行分析，将公司信息披露质量的有效性，融合进资本市场投资者的反应中，这样既避免了信息披露指数可能存在的统计指标的遗漏，同时动态地揭示了信息披露质量衡量的变化过程，是一个比较全面的度量上市公司对外信息披露质量的变量。通过对 KV 值及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董事会秘书个人特征（学历、年龄、任职经验等变量）的度量 and 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认为上市商业银行董事会秘书持股并没有遵循传统观点，不但没有造成信息披露质量下降，相反却使信息披露质量得到了提高；董事会秘书的个人特征没有较好地得到发挥，上市银行整体的信息披露质量没有相应提高。

那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的“反常”结果呢？我国五家董事会秘书持股的商业银行分别为：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建设银行与招商银行。观察这五家商业银行和其董事会秘书的特征：首先，这五家银行的董事会秘书在 2007-2012 年间一直担任其职，有的人甚至从 2004 年即开始担任董事会秘书，而一直没有由他人担任，可以说明其任职时间长的特点。其二，北京银行、宁波银行、南京银行为三家城市商业银行，资产规模相比其他上市银行较小。其三，建设银行与招商银行的董事会秘书持有的股份为 H 股和 H 股的股权激励。总结这三个特征，可以得出以下推理结论：任职时间长，H 股信息披露质量要求高，股权激励更是在长期激励高层管理人员，这些原因也许会造成持股的董事会秘书考虑自身所持股票价值的时间期限增加，对短期股价利益的需求降低，从而没有形成“内部人控制”以降低信息披露的质量。其次，城市商业银行规模小，财务报表方法更简单一些，也许无法采取大型商业银行监管资本套利等方法，这些也约束了董事会秘书挑选“好信息”、“坏信息”的选择余地，也即董事会秘书可以进行加工的信息比较少。以上推理，或许是造成我国上市商业银行董事会秘书提高了信息披露质量的“反常”现象的原因。

12. 境外战略投资者提高了我国商业银行的经营效率吗？

张瑜（天津财经大学）、殷书炉 刘廷华（南开大学），《经济评论》2014 年第 2 期

2003 年底，新成立的汇金公司向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注资 450 亿美元，启动了商业银行股份制改造的试点，2004 年初，两家试点银行的大规模财务重组全面展开，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分别再次核销、剥离了上千亿的不良资产，2008 年 11 月，中央汇金公司向

农业银行注资 1300 亿元人民币，在完成财务重组以后，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工商银行和农业银行分别在 2004 年 8 月和 9 月、2005 年 10 月及 2009 年 1 月改制成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重组仅仅是改革的前奏，通过股份制改造建立现代公司治理框架，借助战略引资推动中资银行特别是国有商业银行的内部改革并最终实现在资本市场上市，成为改革的主要路径。除了引资外，还希望通过引进境外战略投资者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2003 年 12 月 8 日，银监会发布《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首次以部门规章的形式明确了境外投资者入股的资格条件，改变了以往个案报批的做法，并且放宽了外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的比例。根据该《办法》，单个境外金融机构向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不得超过 20%；多个境外金融机构对非上市中资金融机构投资入股比例合计达到或超过 25% 的，对该非上市金融机构按照外资金融机构实施监督管理。截至 2010 年，引进境外投资的中资银行已经达到 31 家，其中中国工商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交通银行 4 家国有大型商业银行先后引进 9 家境外机构投资者，24 家中小商业银行引进 33 家境外机构投资者，3 家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引进 3 家境外机构投资者，共引进资本 327.8 亿美元。从目前的情况看，本轮银行业改革取得了令人瞩目的阶段性成就，不良贷款率降至 1.1%，2011 年净利润为 1.04 万亿，增长速度达到 38.4%。在 2011 年世界银行 1000 强的排名中，中国银行业都取得了斐然成绩。此次排名的结果显示，中国银行业的进步不仅仅是绝对数据上的扩张，还更包含了行业的结构优化和核心竞争力的提高。中国工商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和中国银行进入全球银行 1000 强的前 10 名，被国际同业描述为“前所未有”的成就。

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考察了从 1999 年开始的我国商业银行战略引资对商业银行的核心竞争力指标——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全要素生产率衡量的是银行生产经营活动的效率，即剔除了投入要素的数量增长的影响，而银行追求的是流动性、安全性和盈利性的统一，在追求利润的同时必须控制风险，因此在计算银行的全要素生产率时，必须考虑不良贷款的约束，进而计算出我国银行业整体的全要素生产率呈现出改进的趋势，这主要得益于我国金融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和现代化支付系统的建设。接下来我们检验了我国商业银行改革重要一环的境外战略投资者对我国商业银行全要素生产率的影响，结果表明：随着境外投资者比例的上升，本国银行的效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若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控股比例较低，一方面说明战略引资者对参股银行的影响力较小，对于一些重大问题，即便有心也无力；另一方面也说明外资金融机构缺乏足够的激励参与银行的经营管理。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水平是商业银行效率发生方向性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且境外战略投资者持股的时间越长，对银行生产率的促进作用越明显。

13. 居民幸福感与公共品货币价值评估

刘蓉 王雯 (西南财经大学)

《从显示性偏好到描述性偏好再到幸福指数——公共品价值评估的几种研究

方法述评》，《经济评论》2014年第2期

评估地方公共品和其他非市场性产品的价值是目前应用经济学面临的巨大挑战之一。国防、司法、清洁空气等公共品对个人价值几何？更一般地，这一问题其实就是个人如何为公共品或公共供给的产品定价。根据公共品的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个人完全没有动机公开其对公共品尤其是非排他产品的真实需求，这就很容易低估这些公共品的真实价值。

1974年，伊斯特林发表了一篇关于个人收入与幸福之间关系的开拓性论文，其著名的“伊斯特林悖论”引发了经济学家对幸福研究的兴趣。随着幸福经济学的日渐成熟，一种基于幸福感调查的新方法，幸福指数法，又叫生活满意度法，开始作为一种为公共品定价的可选方法被引入，公共品尤其是环境质量、公共资源等与幸福之间的关系开始引起关注。这一方法通过幸福指数问卷调查将个体报告的主观福利水平和公共品具体情况相关联，就生活满意度直接来评估，或者当自我描述的幸福指数和个人、社会经济因素、区位地理因素等有关时，就可以建立幸福函数。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估测出公共品和收入的边际效用，从而计算二者之间的权衡比率。

目前，幸福感调查问卷已经被用于评估机场噪音、洪水灾害、恐怖袭击、收入不平等以及气候变化等的货币价值。威尔士在2002年发现二氧化氮排放造成的空气污染对于主观幸福感具有可测量的影响，在此条件下，空气质量的改善就具有相当大的货币价值。2006年，他进一步估计出减少二氧化氮和铅污染可以带来人均1200美元的经济效益，而在2007年他将此结果更新为人均2200美元。莱文森（2012）估计出美国空气污染每增加一个单位对幸福感的负效用相当于年收入减少459美元，也就是每天减少1.26美元。具体而言，二氧化硫排放量每增加一单位给居民带来的痛苦相当于总收入减少17%。费雷拉等（2006）测算出爱尔兰居民愿意为减少一单位的PM10支付1100欧元。雷丹兹和麦迪森（2005）发现高温、严寒等极端天气对主观幸福感是有害的，尤其是春旱对农村居民幸福感的损害等价于家庭年收入减少18000澳元，且2002年的干旱对幸福感的损害等价于国民收入减少54亿澳元。

卢庆阁和拉斯齐（2009）证明了洪涝灾害对主观幸福感有较大的负面影响，平均而言，18个月以内遭受过洪灾影响的居民所报告的生活满意度要比其他人低0.035分（四分制量表），居民愿意支付0.7%的家庭年收入或195美元用以降低2.6%的洪灾发生概率。迪特拉和麦扣洛克（1999）计算出通胀率每提高一个百分点，人均收入将缩水150美元（以1985年为基年），即通胀率每提高1%会引致人均收入2%的福利成本。何立新和潘春阳（2011）测算出中国机会不均等感知指数每上升0.1，居民“潜在主观幸福感”将下降0.063，且低、中低、中高、高四大收入阶层居民的“潜在主观幸福感”将分别下降0.095、0.076、0.047和0.040。

里查德·莱亚德在2006年就提出，公共经济学理论急需改革，因为它无法解释人类福利的近代发展史，并且忽视了现代心理学的一些主要发现。这样看来，把主观福利和幸福感引入公共品定价领域，利用幸福指数评估公共品货币价值，不仅极大地丰富和完善了公共经济学，未来必将公共品价值评估理论及实证研究推向另一个巅峰。

《经济评论》简介

《经济评论》是由教育部主管、武汉大学主办的经济学术期刊，创刊于 1980 年，面向国内外公开发行人。本刊坚持“让思想引领学术、以学术砥砺思想”的基本理念，立足于中国经济实践，瞄准当代世界经济学理论前沿，致力于推动中国经济学研究的现代化、本土化和规范化，发表经济学领域各类学术规范、方法现代、研究深入且具原创性的学术论文和评论文章。

《经济评论》为全国中文核心期刊、全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CSSCI 来源期刊、全国优秀经济期刊、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期刊、2012 和 2013 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湖北省人文社会科学优秀精品期刊。

据中国知网统计，本刊的机构用户分布在 27 个国家和地区，如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斯坦福大学，英国的剑桥大学、牛津大学等；个人读者分布在 28 个国家和地区。每年都有大量论文被《新华文摘》、《人民日报》、《光明日报》、《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高校文科学术文摘》以及中国人民大学报刊资料复印中心各种期刊等众多报刊文摘转载和转摘。

在最新版《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全国 69 种经济学理论核心期刊中，《经济评论》排名第 4；在最新版《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全国 25 种综合性经济学专业核心期刊中，《经济评论》位居第 5；在《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2012 版）》和《中国学术期刊国际引证报告（2013 版）》中，《经济评论》连续两次被评为“中国最具国际影响力学术期刊”。

作者可以进入本刊网站 (<http://jcr.whu.edu.cn>) 网上投稿审稿系统在线投稿。根据相关提示操作，即可完成注册、投稿。完成投稿后，还可以通过“作者中心”在线查询稿件处理状态。本刊不收取版面费、审稿费等任何费用。

主管：教育部

主办：武汉大学

编辑出版：《经济评论》编辑部

简报责任编辑：杨丽艳

联系电话：027-68754563

E-mail: whujcr@163.com
